

市场经济与 文化管理

● 市场经济下对文化经营的宏观思考
● 文化市场现状的理性审视

● 弘扬民族文化 提倡高雅艺术
● 民俗文化节日宏观调控机制系统特征
● 国外文化管理体制

金冠军 著
郭常明

学林出版社

SHICHANG JINGJI YU WENHUA GUANLI

SHICHANG JINGJI YU WENHUA GUAN LI

市场经济 与 文化管理

金冠军 著
郭常明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徐智明

特约编辑：阎 平

封面设计：沈兆荣

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 金冠军 郭常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52,000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616-106-6/F·8

定价 9.50 元

文化管理学的新收获

(序言)

吴欢章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经济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莫不处于变革之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10余年间,我国的文化事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不是局部性的变化,而是总体性的变化。其中既有新的生机,新的成绩,新的繁荣,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而且贯串着新旧观念的斗争。在变革中前进的文化事业,给文化管理科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迫切的课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给以解答和支持,这既是现实对理论的挑战,也是理论得以发展的机遇。金冠军、郭常明两位同志所著的《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一书,便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管理学新成果。现实性,我觉得这是《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这部著作的一个可贵的学术品格。经济体制变化了,文化管理作为文化事业的一种组织调节机制,如果墨守成规,不能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就会使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发生尖锐的矛盾,得不到协调的发展,这不但会阻碍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对新经济体制的建立产生消极的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文化管

理体制,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就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亟待解决而又没有完全解决的理论课题。金冠军和郭常明同志抓住这个现实焦点,围绕这个中心,几乎全方位地探索了文化管理体制中许多重大的问题,譬如文化经济政策问题、文化资源的配置问题、文化管理的组织结构问题、现代都市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群众文化经营战略问题,社区文化与企业文化问题等等,并且他们在研究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时,又不是空洞抽象地进行理论上的思考,而是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这样理论之矢就准确地射中现实问题之的,使他们的研究成果既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又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我以为,《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这部著作还有一个可贵的学术品格,就是它观察和分析问题充满改革精神。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旧的平衡被打破而又建立新的平衡,这是经济和文化得以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看出,金冠军和郭常明同志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积极探索文化管理的体制、方针、政策、运行机制等等如何去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促使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平衡从而获得协调的发展。我们还应注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本身也会出现不完全平衡的状态,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出现某些无序的消极现象,例如近年来营利性的文化娱乐业高速发展,而高层次的文化事业则颇为滞后,面对这类可能令人困惑的状况,金冠军和郭常明同志也能遵循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冷静地分析原因,找出对策,探索如何运用文化管理的调控机制,努力促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均衡的、协调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回答和解决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说明人类更要改造世界,这在社

会急遽变革的转型期尤其是如此。《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这部著作所具备的现实性和革新性的学术品格，正表现了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文化管理体制，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和文化的状况都特别复杂，既会由于历史惰性力产生种种保守主义，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绝对化思潮。我们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管理体制的路子时，既要有改革的坚定性，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譬如怎样处理文化事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就是摆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偏重讲求社会效益，而今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应单纯讲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效益？对于这个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金冠军和郭常明同志的《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一书显示了可贵的辩证思维方式，他们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探索了文化管理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在文化的地位和功能上，他们认为文化事业应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文化生产有区别于物质生产的特殊功能，文化事业的作用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文化层次上，他们把社会主义文化区分为民族文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三个层次，主张首先要弘扬民族文化，倡导高雅文化，同时也要发展通俗文化，而且须在三者之间建立契合点，使前二者能适应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得到广泛的传播，使后者能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向高层次发展；在文化产业结构上，他们根据经营目的和市场状态把文化组织区分为“非市场——非营利”、“市场——非营利”、“市场——营利”三类，主张运用有区别的政策加以分类管理和指导，使文化事业获得整体

的发展；在文化资源配置上，他们提出文化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标准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第一位，同时又要充分利用其生产上的物质性资源，使其有较大的产出效用，而且他们主张实行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相融合的政府主导文化市场调节文化资源配置模式，为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文化经济政策上，他们主张应有利于优化文化资源的配置，有助于文化事业全面均衡地发展，譬如对于文化产业的税收应实行相对于物质生产的优惠政策，对于高雅艺术应实行有别于娱乐业的差别税率政策，为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应实行返税政策，为了促使社会赞助文化事业应实行冲抵或减免税收政策。总而言之，金冠军和郭常明同志探索当前文化管理改革时，总是全面而不是片面地观察问题，他们总是对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共性和个性、局部和整体、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进行辩证的思考，因而他们提出的改革主张既积极又稳妥，有利于市场经济下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日益深入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越来越迫切地提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学的任务，同时也为实现这任务创造了愈益成熟的条件。我们不能说《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一书已经建构了文化管理学的完整体系，但是应该说它在这方面的确跨出了可贵的一步。至少这部书所提供的一些思路，可以作为创建文化管理学的某种参考。一是它努力掌握总体的战略框架。这部书研究市场经济下的文化管理体制，总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总目标，总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任务。二是它努力开掘深远的历史的内涵。这部书总是从历史联系中来研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它注重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在的成绩和问题，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善于通过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嬗变演化

把握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三是它努力拓展广阔的理论视野。这部书观察当前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既注意向外国的文化管理借鉴经验和吸取教训，又注重综合运用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至系统论、控制论等多种理论知识进行观照，有了多种参照系、多种视角和方法，就易于把研究定位在比较准确和深刻的程度上。我想，在我们进一步建构文化管理学时，《市场经济与文化管理》所提供的这些经验是可资借鉴的。当然，萌芽还不是大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管理学，还是一个有待于完成的重大任务。历史在召唤，大家须要继续努力！

1995年10月，写于上海大学

目 录

文化管理学的新收获(序言).....	吴欢章
文化管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1
市场经济体制与文化经济政策	9
论文化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协调控制.....	29
文化资源的市场机制配置和政府宏观调控.....	39
市场运行机制和现代都市文化发展战略.....	58
弘扬民族文化 倡导高雅艺术.....	66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文化策略	
群众文化经营战略思考.....	74
论市场经济下对社区文化的理性审视.....	81
民俗文化节日宏观调控机制系统特征论.....	89
论社区群众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耦合度.....	98
权变观与组织结构	110
——浅析群众文化事业单位组织结构变化中的权变因素	
市场经济下社区群众文化的再认识	118
——香港文化考察之思索	
上海市群众文化事业现状与对策	132
上海市文化市场的现状和引导对策	146
国际化大都市社区文化的管理定势	164
国外文化管理体制与经营方式初探	173
部分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简介	202

文化管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文化管理学是文化研究和管理科学领域内一门日益显得重要的学科。近年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文化信息空前膨胀,推动着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变动。文化管理作为文化事业的一种组织调节机制,已越来越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关注。广播、电影、电视、表演团体、出版、文物、图书馆、群众文化等文化部门要在当今社会获得发展,不能不借助于自身管理的不断完善和加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其规律性的总结——文化管理学。

文化管理学顾名思义与文化有关,但在通常情况下,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这是因为在文化事业内部,文化管理区别于其他部门的主要标志就是管理。在建国以来的文化管理史上,尽管具体制度、具体措施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观照文化管理的两个基本视角没变。一是政治视角。根本的一点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对文化管理的领导,这对于保证文化事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必需的。但是由于把文化仅当作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现象,过多地从政治角度、采用政治方法进行文化管理,也产生了种种与文化正常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二是行政视角。各个文化事业单位作为一种机构,在行政上必然要受到各种调节和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行政管理往往通过法令、指

令、规章等形式开展，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还不能涵盖文化管理的全部作用。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实行，文化管理又增添了一种视角，这就是经济视角。其特点是把文化事业也当作一种经济活动来看待，突出了文化事业的经济效益，例如讲究票房规律、建立文化经纪组织、文化团体实行经济核算，等等。显然，作为一种非物质生产过程，经济视角的引入确实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几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光讲经济效益似乎也不能解决文化发展的全部问题，有时还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容回避的消极因素。由此看来，上述三种视角都有其合理的、必要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不能只顾一头，不及其余。

当前，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热”的兴起，各门人文科学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这种情况下，引进文化学原理，从而在文化管理领域内运用文化视角，有利于拓宽思路，放开眼界，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文化管理学与文化学的结合，可以从两个角度探讨：

一、文化管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本身具有文化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为复杂、很难作规范性解释的概念，通常可把它分作广义与狭义两种范畴。建立在广义基础上的文化学，是在各具体学科对文化反省的基础上，进行关于文化总体的、一般的研究的学科。简单说来，它是对文化形态的特有把握方式。它把文化形态看成是由历史发展形成的具有系统性的形态，并且有层次和结构。一种文化形态包含3个层面：（一）物质文化——工具、工艺、技术产品；（二）精神文化——宗教、哲

学、法律等意识形态；（三）文化价值系统——风俗、伦理、道德、艺术、行为样式。

从文化学的特定背景下来考察文化管理，可以发现它确实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它是跨越上述3个层面的一个结构网络。例如从出版管理来说，一本出版物的价值实现，必须经历编辑、印刷、发行3个过程，如果说，编辑过程较多反映出精神文化特点的话，那么印刷就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而发行过程则受到读者社会的价值判断的深刻影响。出版管理则与这3个过程紧密相连。电影制作也是如此，摄制、生产、发行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管理也就必然同时渗透各个部分。其他如文化经纪活动、艺术团体管理、群众文化管理，也莫不受到精神的、经济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巨大影响。

由于文化管理在整个文化形态中占有的特殊地位，在它身上反映出的文化现象也必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化管理特别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特征。文化管理包涵的政策、法令、制度、体制、规划以及人事、组织、财务、经营等方面的具体职能，无不是社会文化形态的深刻反映，其本身又成为特定文化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作为目前群众文化之一的营利性舞会的管理，便反映出开放形势下的某种微妙进程：一方面，营利性舞会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承认，近年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大、中、小城市都比比皆是，反映出群众文化娱乐的新要求、新潮流；另一方面，营利性舞会又受到种种限制，从售票制度（不公开售个别票）到门卫制度（门口有保卫人员巡逻），从灯光（不能太暗）到音乐（不能太强烈）都有各种具体规定，反映出文化适应的有限与观念上的滞后状态。

其次，文化管理的演变是整个文化演变的一个缩影。现代文化学越来越注重文化形态的变迁历史，即一种文化的内部在

时间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法国大百科全书》“文化”条目中这样写道：“文化演变问题，是人类学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阐明一种文化的演变过程是研究该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而文化的每一个变动，都或多或少地在文化管理上反映出来。有时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化形态的某种变动，只有在文化管理的变动中得到鲜明的表达和具体的说明。这是因为文化形态本身的变迁往往表现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者是深层结构的缓慢流动，因而难以进行确定的表象把握；文化管理的调整和变动则是文化演变的一种逻辑反应，具有明确的表征性。例如上海某些艺术团体近年来体制不断改革，先是由原来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改为团长负责制，之后在人员的构成方式上也采用多种管理模式并存的局面，除了传统的“组织分配模式”之外，又出现了“自愿结合模式”、“聘用制模式”、“名角组团模式”等。以新的管理模式组织起来的演出团体，经济上往往自负盈亏，因此，也促进了文化经纪活动的活跃。这种变化应当说是反映出当前文化生活的这样一种动态：艺术活动日益民间化、大众化，更加符合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也突出了经济效益和商业化倾向。

再次，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管理的差异也是此地域与彼地域文化差异的一个象征或标志。如果说，文化演变是时间上的概念，那么，文化差异则是空间上的概念。对文化差异的考察及其比较是文化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文化管理亦是这个课题中可供操作的对象之一。当我们研究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时，我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文化管理出发。例如我们不但可以从文化制度的根本差别中看出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差别，而且还可以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各国与我国在文化管理上的差别，看出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特征。同样，当我们研究

同一民族或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别时，也可以从各地文化管理的不同特色中看出端倪。例如，上海人看深圳特区文化管理所具有的“开放”特点有时会感到不理解，而对内地某些地区文化信息的闭塞和管理方式的陈旧落后也同样感到惊异，这其实都可以看作这些地区的文化由于种种历史的、国际的原因而存在着的差别。

由此看来，在文化管理学中运用文化视角将对文化管理产生新的认识，对它的重要意义也会有更深切的感受。而过去只是把文化管理当作单纯的行政管理来看待，对它的理解又只侧重于政治视角的状况，看来是不全面的，也不利于文化管理的发展和管理学建立。

二、文化学原理的引用和渗透，将推动文化管理学的更大发展。

文化管理不仅是整个文化形态的反映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其自身的发展还对文化形态的自觉把握有密切关系。过去，文化管理演变的主要依据是文化政策的演变，而对文化形态变化的反应十分迟钝，因而文化管理的状况往往落后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总是被动地跟在不断变化了的社会文化后面跑，有时甚至成为文化发展的阻力。笔者认为，在建立和发展文化管理学的时候，必须注意以文化学原理加以观照，从而把文化管理与文化形态更加深刻地关联起来。本文粗略地将之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文化管理与文化模式的构成

对文化作出比较现代化解释的结构主义文化学认为，文化形态内部各系统不仅有各自的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

存在着结构关系，它们都存在于统一的文化模式之中，在这意义上，文化是超越人类个别行为之上并且制约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符号结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柯亨这样说：“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之因素。”

文化管理在文化模式构成中的地位，可从两个角度理解：首先，它是文化模式构成的中介。它渗透在文化各系统之中。因而，如果它不与整个文化结构相和谐，便会阻碍文化的发展，反之，如果它与整个文化模式同构，便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文化管理作为文化的外显行为模式，它所包含的政策法令、制度、组织等也应当是一种体系构成，它们之间应当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而不能是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因此，文化管理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根据这种特点，文化管理在调整、协调各种文化关系时，就应当把对象作为统一的文化事业来看待，就应当考虑各种管理成份的客观和主观的文化条件及其所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还要考虑文化事业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相互依存性的增长因素，从而使文化管理各种成份相互配套并与整个文化模式同构。

二、文化管理与文化选择机制

现代文化学表明，某些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复合体中同时出现，另一些文化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演变或消失，这是由不同文明的接触产生的文化传播等客观现象所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国际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在社会系统自我调节机能作用下，文化选择势所难免。文化选择推动社会单元和个人的文化日趋合理。在这意义上，“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文化“是在不断扬弃愚昧中由愚昧转化而来

的。”(刘家和:《略说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集)

文化管理在文化选择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文化交流过程中选择性受到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形态阶段的影响,是建立在文化适应的基础之上的。列维·斯特劳斯在谈论文化适应问题时指出,文化是依据人们思维规律从自然的现实剪影中产生出来的,它产生于不自觉的逻辑反映。F·博阿斯则认为,不宜把文化适应视为与两个民族接触有必然联系的一个过程,而应视为依赖于不自觉的心理因素的一种现象。文化管理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不自觉状态的一个自觉扬弃和吸收。文化管理所具有的行为样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种文化现象或因素的取舍。因此,文化管理实质上是文化选择中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它对社会能否及时和最大限度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或抑制的作用。对文化管理的这种作用机制进行认识 and 规定,无疑将有助于增强文化管理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三、文化管理与文化主体创造性的发挥

在众多的“文化”意义中,其中有一个内涵已得到公认,即文化是区别于“自然和天然”的“人造物”,其本质是创造。一种文化的发达程度与该社会文化主体(团体、个人)创造的自觉性程度成正比。包括汤因比在内的众多的文化学者都认为,文化就是人类依据自己的能力在与环境作斗争中所创造的成果。

社会文化团体和个人,一方面是作为文化主体而存在,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就在于不断创造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文化管理调整的对象或客体。因此,文化管理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这些客体的创造性。

但在实际情况中,文化管理有时能促进文化主体创造性的发挥,有时则不能起到促进作用反而成了阻碍这种创造性发挥的因素。这种状况显然与文化管理往往受到传统观念和先验模

式的制约有关,而这种观念和模式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在这意义上,文化主体创造性发达程度,既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发达的程度,又体现出文化管理的效能是否积极。

任何管理都是通过对人有意义的“信号”来实现的,这种“信号”是在整个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与经济管理等其他管理不同,文化管理的信号系统应更具有弹性,更讲究人的心理适应机能,在这种管理中反映出的文化因素也就更丰富,作用更直接。因而,从有利于文化主体创造性发挥出发,文化管理必须注重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既要建立在千百万管理人员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和知识上,更要建立在对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全部成果的运用上。这里,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哲学、政治、历史、法律、文艺、宗教、语言、伦理、心理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要积极采用科学方法和技术器材。现在,控制论、数学、电子计算机等不仅在经济等物质生产部门被运用,而且也日益运用于文化管理中的预测、规划、信息反馈等工作的过程中,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管理的一个重大突破,将对文化主体创造性的发挥起到深远的影响。

总之,文化管理学如果忽视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而在文化管理学中建立起文化视角,无疑将极大地促进文化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的进程,使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